

沈从文小说的解释漩涡

陈 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由于对具体语境的偏离,沈从文小说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属于过度解码,造成了作家论的独断和读者论的夸张。引入“元语言”和“解释漩涡”等符号学的概念,对沈从文的《萧萧》《丈夫》和《柏子》等“湘西系列小说”进行一次符号学重读。在解释沈从文小说的过程中,解释者如果使用了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这些元语言集合发生在同一次解释中就会形成冲突,两种或多种解释悖论性地并存而且意义都合理,形成解释漩涡,使得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具有无限的丰富性,而这正是沈从文的作品之于文学史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沈从文;过度解码;元语言集合;解释漩涡;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181(2016)04-0037-05

一 学界对沈从文小说的过度解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夏志清在其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辟专章对沈从文进行研究以来,海内外学界对沈从文的研讨从未止息。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领域:“湘西系列小说”及其衍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都市文明系列小说”研究、苗族题材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生平研究。其中,对沈从文的小说研究,学界又分为三派:赞誉派、批评派、海外汉学派。赞誉派以凌宇、吴福辉、刘洪涛等为代表,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因其牧歌风格而表现了湘西世界的人性的美好和良善;批评派以赵园、刘永泰为代表,认为沈从文其人其小说分别表现了哲学和人性的贫困;海外汉学派以夏志清、金介甫、聂华苓为代表,折中而取,也基本上采取的是赞誉态度。

为方便论述,笔者有必要引出一个符号学概念:符码(code)。符码是在符号表意过程中,控制文本生成时的意义植入规则和控制解释达成时的意义重建规则。理想的符号传达过程,由符号发送者和接收者共同构成,发送者根据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

码”(encoding),意义被植入符号文本;接收者对符号信息进行相应的“解码”(decoding),符号信息被转换成意义,所以符码是解释意义的规则。^{[1]223} 文学文本作为意义不明确的弱编码,发送者无法控制解释者对文本的解释,解释者也不能说明自己的解释完全正确,解释变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于是,编码和解码概念的引入,就同时避开了作家论的独断和读者论的夸张。就接受而言,对文本的解码自然会形成两个极端:不足解码(under-decoding)与附加解码(over-decoding),前者是由于解释者对文本的符码不够了解而对文本进行的试探性解码,艾柯(Umberto Eco)称之为“阐释性假设”^{[2]152},后者是解释者添加一些原来文本没有的符码而进行的强制性解释。

由于强制性解释的主观性,对同一个文本,不同的人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理解,这构成了读者反应论的理论基础。赵毅衡认为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些解释的有效性,解释只能逐渐靠近某个适量解码。^{[1]224} 赵毅衡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略去了对语境的关注。艾柯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认为语境具有选择功能,因此在某些场合下可以消除歧义而到达解释

收稿日期:2016-04-18

作者简介:陈 飞(1991-),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

的融合。^{[2]153}笔者认为,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释,超出语境,就超出了解释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的附加解码就失去了有效性,变成了“过度解码”。

学界对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研究正是这种过度解码的典例。凌宇在解读《萧萧》《丈夫》《柏子》《贵生》等文本的时候,认为童养媳制、卖淫制、雇工制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展示出一种悲惨的命运,缺乏对命运的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3]243}吴福辉在那本影响颇为广泛的教材中的看法是,作为童养媳的萧萧的命运是悲凉的,萧萧对自身的可怜生命毫无意识。^{[4]214}对沈从文进行严厉批评的刘永泰更是认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5]刘西涓在《〈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6]203}此说几乎得到学界一致同意,引用率极高,不一而足。李影心的《评〈八骏图〉》认为《柏子》完全表现的是性的麻醉和兴奋,不是一种适宜的生存方式。^{[6]209}朱栋霖等人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认为《萧萧》表现了生命悲剧的不断轮回,根因在于乡下人理性的蒙昧,^{[7]207}萧萧的“悲剧轮回说”大量见于各种论著,主要是肇自此始。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学界的上述研究,而是对这种偏离语境的过度解码提出异议,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沈从文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强制性解释的合法性,只是想说明任何解释都应该有一个限度,此限度之一维,便在符号发送者那里。沈从文的未竟稿《抽象的抒情》有一段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8]527}其哲理散文《水云》的副标题为“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他所写的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0]6}并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以取得人事上的调和;而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则是其对“希腊小庙”的向往,他认为他建造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11]2}沈从文如此表述,其对湘西世界的爱怜是很明显的,其神庙也不可能供奉他不认可的人性范畴的东西,因此,上述学者的结论就与沈从文的态度相悖,沈从文认可的东西在众多学者笔下成为了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学界对沈从文所做的断章取义式解读偏离了沈从文所预设的

“意图意义”^{[1]184},解释非但没有到达沈从文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点,反而变成了脱离语境的过度解码。

既然这些解释本身是强制性的,又同时具备合法性,二者在表面上就是冲突的。缘何如此?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解释是否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的?为何笔者对学界关于沈从文小说的过度解码只是提出异议而没有一味否认?

二 解释漩涡与沈从文小说意义的丰富性

要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笔者首先需要介绍赵毅衡关于元语言(meta-language)的论述。赵毅衡将元语言定义为符码的集合,任何符号表意行为只要被当作意义传播,就必须有相应的元语言来提供解释的符码,而意义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可以用另一套符号体系来解释,因此元语言是理解符号文本的关键。对文本的解释需要元语言集合的支撑,符号接收者在每一次解释时都提出一个临时性的元语言集合,并且就算是对同一文本的每次解释可能都不尽相同。元语言如此变动不居的特点致使解释者的每次解释行为都调动不同的元语言因素以形成新的元语言集合,从而使同一文本能产生无穷的歧出意义。^{[1]223-242}

由于每个人所使用的元语言不同,学界对沈从文小说的解释也可能各不相同,各人的元语言互不干涉,没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上文中没有否认各种对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强制性解释的原因,不同的人及其使用的不同的元语言所得出的不同解释都各自具备其合法性。而元语言的构成,直接影响了文本的释义。赵毅衡把用于解释的元语言因素分为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自携的元语言。

语境元语言是指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萧萧》的语境元语言即是湘西农村及其隐蔽的意识形态性,《丈夫》和《柏子》的语境元语言是湘西农村和河岸渔船或吊脚楼生活的交织,当然,语境元语言可以存在于文本之内,也可以存在于文本之外,即由生产方式所影响的整个社会语境。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是马克思的名言“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

世界历史的产物”^{[12]87}的符号学表述。文本自携元语言包括体裁、修辞等伴随文本,当符号侧重于符码时,文本就提供了解释的线索,其元语言标记相当普遍。沈从文在叙述中经常插入指点性评论,比如《从文自传》《长河集》。

在解释《丈夫》《萧萧》和《柏子》的时候,如果单纯根据解释者自身携带的能力元语言来对文本意义进行解码的话,解释者就会陷入“解释漩涡”(vortex of interpretations):解释者如果使用了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这些元语言集合发生在同一层次的同一次解释中,就会造成同层次的元语言冲突,两种或多种解释悖论性地并存而且意义都是合理的,解释漩涡便由此形成。^{[1]235}

妓女是女人最古老的职业,是人类常态生活之外的边缘生活,这是较为极端的看法。但即使不这样看,《丈夫》也很难用道德或不道德来判定,因为沈从文明言“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9]117}。解释者在面对文本的时候,文本迫于语境的压力而对一种既定的价值观呈现出反抗的趋势。《丈夫》中的妓女老七在外接客的行为是得到丈夫的许可的,这也是他们乡下的“传统”,而当其丈夫从乡下来看她时,最开始也表现出很自然的态度,并未觉得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睡觉有什么不妥,只是后来由于丈夫的本能意识的觉醒,才觉得异常难受,夫妻俩第二天一大早才回了乡下。从接受论的角度而言,老七的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传统的观点当然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这不符合婚姻的要求,也是违背人性伦常的。但是老七却得到了丈夫的许可,这样一来,传统的道德观便不适用了,解释者无法用传统的道德观来审视老七和她的丈夫,简单地认为他们不道德。文本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的压力下,产生了悖论,道德与非道德的两套元语言集合都产生了效力,冲突意义并置,让文本解释者陷入了解释漩涡,进退两难。

丈夫在几乎目睹了妻子接客的情况下,渐渐退却了先前的从容,变得难受,表现得十分沉默。丈夫的沉默或许可以看作是文本的沉默,因为除此而外,叙述者没有任何表明态度的叙述痕迹。在这样的沉默下,丈夫与湘西世界发生了冲突,由他们组成的世界也被他们亲手给摧毁了。于是笔者发现,没有任

何一套现成的元语言集合可以为此提供解释,解释者必须保持一定的“批评超越距离”,^{[13]280}也就是说解释者必须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或之上,才有可能发掘出该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漩涡导致了沈从文的小说文本的意义的多样性,持有不同元语言集合的人,都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进行强制性编码,所以任何单一偏狭的解释的有效性都存疑。

《萧萧》的断裂之处更为明显。萧萧和花狗发生关系后,生下了儿子,于是她就不被沉潭或发卖了,萧萧继续留在小丈夫家里。萧萧和《丈夫》中的丈夫一样,他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压抑,但他们最后都打破了湘西世界的法则,前者得以继续稳定生活,后者和妻子一同回乡下生活。至此,笔者并不认同上文提及的吴福辉等学者对萧萧命运的表述。笔者想问,怎样才算对自身生命有意识?既然萧萧的命运注定是她无法选择的,那么她就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当一个童养媳。从萧萧的立场而言,萧萧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她只是在安静地适应生活。花狗打乱了萧萧安静的生活,使她怀孕,然而花狗也并未对萧萧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最后萧萧是否遵循族规而沉潭,其实无关大局,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文本在萧萧生下男孩后,便发生了断裂,她不被沉潭或发卖了。这样一来,按照萧萧的命运轨迹,悲凉只在于她是一个童养媳,而她的结局却不算是悲凉的,她仍然可以安静地继续生活在小丈夫家里。

通过这样的分析,笔者看到了沈从文的良苦用心:萧萧的“无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性的美好与良善,这种人性的美好与良善可以与世俗进行抗衡,甚至更新了传统文化元语言集合。夏志清看完《萧萧》以后,精神为之一爽,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在萧萧的身心并未留下损害的痕迹,这是一切事物理应有的自然状态。^{[14]172}笔者通过两次解释,两次的元语言冲突,认为凌宇和夏志清等人的对立看法都可以同时存在于解释者的脑海之中,而且并不能互相取消,两种解释同样有效,共同构成了《萧萧》文本意义的多样性,这也是沈从文反复言及的“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15]319}之两套话语体系的同时显现。

因此,笔者不能理解,为何现代学者要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话语强加于一个淳朴无辜的湘西少

女?凌宇既然已经明确表示沈从文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形成的特殊道德形态”^[16]来组织笔下的湘西世界,为何又质疑乡下人现代理性精神的缺失,甚至认为沈从文在柏子们和萧萧们安于现状的神情背后发出了失望沉重的叹息?^[17]沈从文对此种解读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11]这说明了沈从文深谙不同的元语言集合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释,由于对自己作品的编码相当熟悉(沈从文为自己的小说集写了大量序言),应当说他是看到了解释漩涡的存在,所以总是将“美丽”与“忧愁”、“快乐”与“发愁”、“爱憎”与“哀乐”、“清新”与“热情”、“朴实”与“悲痛”等范畴对立并提,这样两方面的认识带给沈从文以大量的苦恼和冲突,不可调和,于是诉诸笔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高度,连他本人也承认这是一种新道家思想。^{[9]97-98}

三 意识形态情结与自然生命形式的建构

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在讨论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时指出,“文学使用意识形态来挑战意识形态。”^{[18]133}前一个“意识形态”是作家个人在现实社会中出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而形成的观念,后一个“意识形态”则是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沈从文建构的湘西叙述世界可以说几乎“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11]2},因此,传统角度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在沈从文那里是无足轻重的,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结局或命运可以说无关大局,而这种无足轻重正体现在了文本的沉默与断裂处,也在建构湘西世界的同时,沈从文不自觉地建构了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这套独立的意识形态话语便是沈从文面对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态度,以及他用文字对人生所做的一次重新安排。

沈从文的这种安排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抽象原则”^{[9]104},这种抽象原则是一种“情绪的散步”,它“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有论者指出,沈从文在自己的文论中有一套自己的美学词汇:美、爱、生命、生命的庄严、神性、宗教情绪、新道家思想等^[19],这些词汇构成了沈从文的“泛神论”或“泛美论”,源自

于他对生命的信仰^{[9]128},也源自于一种延长和扩大生命的愿望:作家的符号文本表意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抒情。所以沈从文倾心于现象的描绘,用一种“单纯的人生观”对存在做出“较素朴的理解”。^{[9]421}

如此一来,沈从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通了天人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天人合一,而是一种天人的自然观,一种接近自然或与自然相通的生命形态,这已经具备了形而上特征,也就并非刘永泰所指责的是沈从文的“哲学的贫困”。学界之所以会得出《边城》的悲凉意味,在于爱一方面是排他的,纯粹的,但另一方面,在爱的纯粹里,爱情或多或少会受到神谕的或世俗的干扰,最终导致爱的消失。不仅《边城》如此,《月下小景》《龙朱》等佛经改编故事和苗人神话传说故事同样不出上述逻辑。

笔者上面提及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广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学界将沈从文与意识形态问题挂钩也仅局限于讨论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乌托邦建构,这显然源于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错误理解。笔者之所以一直坚持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是因为沈从文在《水云》中反复提到“尺”和“秤”：“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9]94}这一段表述相当精彩,可以说概括了沈从文的一切创作:乡下人、与传统价值取向的不同、作家的意识形态的“较理想的标准”^{[9]107}、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等等。就符号学而言,“尺”、“秤”、“尺寸”和“分量”即是沈从文自己的符码集合(元语言),作家的元语言与“普遍社会”的不合,是沈从文小说形成解释漩涡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更加充分地说明了沈从文的意识形态选择,沈从文面对“偶然”与“情感”,通过写作来证实生命的本质,从而表现一种“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1]5},并以此使生命得到一种平衡,这也是沈从文对未来生存方式的一种美学探求。

沈从文毕生致力于人事的书写,其笔下的人性大部分是基于法度之外的,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元语言可以为沈从文的这几篇小说提供解释的符码,目前通行的关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解读可能只是不足解码或过度解码,因为沈从文的小说里有一套独立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如果不能准确把握

这套话语系统,任何有关沈从文小说的文化意义之评价或多或少会陷入元语言冲突,造成评价漩涡,就很难准确把握沈从文的作品之于文学史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 翁贝托·艾柯.符号学理论[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3]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 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2).
- [6]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 [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9]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0]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3]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 [1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1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16] 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3):141—168.
- [17]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J].文学评论,2002(6):5—17.
- [18]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19] 贺兴安.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84—86.

On the Vortex of Interpretations of SHEN Congwen's Novels

CHEN F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eviation from the concrete context,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ovels of SHEN Congwen are overly decoded, which results in the arbitrary opinions of the writers and overstatements of the interpreters.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read his *Xiaoxiao*, *The Husband*, *Bozi* and other novels about western Hunan Province by introducing some semiotic concepts such as “meta-language” and “vortex of interpretations”. If interpreters use different sets of meta-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his novels, these meta-language collections will lead to some conflicts, and many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s will slot smoothly together, which may cause the vortex of interpretations ensuring the abundant meanings of his novels. And also, this is w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novels i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over-decoding; meta-language collection; vortex of interpretations; ideology